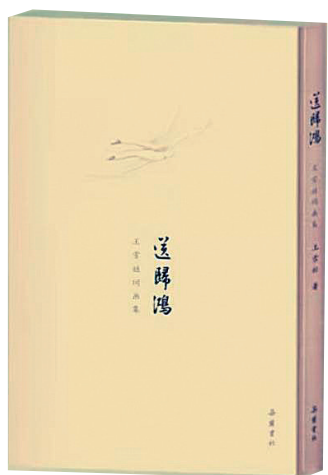


图里书外

最好的归宿是飞翔

——解读王雪娃词画《送归鸿》



蔡世平

王雪娃五岁时偶遇了一只鸿雁。我们知道五岁是一个对事物容易迅速忘掉也容易牢牢记住的年龄,可偏偏这只雁没有被雪娃从记忆中抛掉。雁,参与了雪娃的生活,这生活既是写作的也是情感的。雪娃是小说家,还画油画,她的写作和绘画应该与这只雁有关。

雪娃要来说雁了,不是小说、散文,而是用她的词和画,这就是她的词画集《送归鸿》。

雪娃选择了一种形式上近乎完美的写作。

说完美,是因为词是汉语言文学的极致表达。王国维先生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引用《楚辞·九歌·湘君》里的话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会打扮的漂亮女子。我理解中:“词的神奇性在于,能以最简短的语言实现人性的深度表达,又能以最快速的速度抵达人类遥远的精神故乡”(《南国词话三十七则》)。由此可见,词不仅外表打扮得好看,而且内里也修饰得很美。

雪娃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她要借助汉语言的这个“神器”,完成人生美丽与“心灵风暴”的深度书写。

不难看出,雪娃词中的归鸿是一个隐喻。那么隐喻了什么?

《送归鸿》分四个篇章,分别为“飞鸿”“清影”“如梦”“送归鸿”。在这四个篇章里,雪娃以生命个体独有的敏感与细腻,书写了男女之爱的“欢喜”“贞忠”“离愁”“告别”与“追忆”;书写了关乎家、国的太平与繁荣,“国土安民乐业,光芒照祥天地”(《天香·风于飞》),“词赋华章举国颂,赞神州、满目清气祥和……人天悦、万民齐诵,近世太平华夏山河”(《洞仙歌·清气祥和》)。

随着词章的徐徐展开,雪娃向读者敞开了“飞鸿近,我心悦”的心灵诠释:“千里万里齐飞,比翼与君顾盼”(《双双燕·画双鸿雁》);“合掌对天默许,今生来世相依”(《清平乐·谁解心头意》);也展示了圣洁爱情的清朗月情怀:“月在云天星凤戏,照彻西楼,梦里鸳鸯醉”(《蝶恋花·妆台睡》);“君戴星来。赠我金钗,岁岁今夕梦人怀”。

紧接着,词人写出了美好的爱情被“夜莺伤”了的惨痛现实:“风尘艳女迷香,太张狂,我心伤。失眠一夜,徒被夜莺伤”(《江城子·莫心慌》)。“藕节寸段,段段是心伤。伤里带丝丝万缕,割不断,绕心房”(《江城子雨夜长》)。

在《送归鸿》的最后篇章里,词人以“秋尽冬来妖唱戏……中盅失魂君忘义。旧时美妙成追忆”(《蝶恋花·成追忆》)。“天香夜,与君执手,花好月圆圆……人间事一来一去,梦醒是归鸿”(《满庭芳·是归鸿》),写出了一种并不轻松的生命放达与释怀。

在写此文之前,我与雪娃仅有一面之缘,但我在偶然与非偶然中遇见了雪娃的旧体词与她的油画。我认为作为小说家写作的词集《送归鸿》,完全可以是一个虚构、一种理想,词中刻骨铭心的爱恋可以是假想的。但是,词人王雪娃的词与油画却是真实而永恒的存在,这已足够!

雪娃是一个有精神高度的人,也是一个会思想的人,她知道如何处理题材。雪娃要借助幼时偶遇的一只受伤之鸿雁,告诉这个世界一些值得珍惜、留恋的东西。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雪娃都写出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迷茫,但同时也写出了精神情感的永恒与高贵。

我一直认为,能够成为经典之“词的语言”,对于汉语言来说是吝啬的。因为受“词语”的制约,用几首词表达同一个题材,写好它都难。而用几十首词,集中表达同一个题材就更是难了。迄今,我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位词人在短时间内集中写出相当数量的同一题材的词作。词是一种慢功夫,细致活。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小说家王雪娃的词画集《送归鸿》于此作了有益的尝试,提供了一种写作的可能路径,亦为词坛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借鉴的词文本,对于今天与未来的词创作,极具价值与深意!

(《送归鸿》王雪娃著 岳麓书社出版)

著史者应做的,是尽量还原客观历史

——《军机处二百年》创作谈



袁灿兴

自十余年前确定写作《军机处二百年》一书后,我便开始了繁琐的史料收集工作。幸运的是,当年的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们留下了大量与军机处相关的记载,而清人的笔记、年谱、清廷的实录、上谕,也提供了与军机处有关的海量材料。

军机处的史料浩瀚,如何择取、组合,自然让人费神。在写作中,困扰我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一些重要事件,如果直接写军机处的处理过程,可能较为枯燥,降低了可读性。比如同治年间,天津教案发生之后,引发颇多争执。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内心存在较大矛盾,而他最终的处理结果也存在较大争议,乃至引发了军机处内部的矛盾,进而带来了朝局变动。由曾国藩的心路历程,进而展示军机处内部的博弈与朝局的变动,这样的处理相信会提高本书的可读性。

其次,由于军机处涉及的年代长、事件多,如何避免本书出现碎片化的倾向,也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故而每一朝的写作,尽量围绕中心展开,如雍正朝军机处初创,便以军机处创立的原因、创设的契机、军机处的奠基者等为中心。对乾隆朝,则以十全武功为中心,同时佐以军机处重要人物与事件。对嘉庆朝,由于正处国力下降的过程中,整个政局呈现出保守的倾向,此章就以保守为主题,将军机处置于其中考察。至道光朝,大清帝国已处于衰落曲线的底部,故以面对颓废景象的军机处为主要内容。

再次,此书写作,涉及大量军机处人事制度工作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是较为枯燥的,如廷寄制度,拟定谕旨,军机大臣、军机章京的职责之类。这些内容虽然晦涩,却又是不可或缺的。故在写作中,将这些内容分解开,融入各个章节的故事之中,在不降低可读性的同时,使读者对军机处有更全面的了解。

本书主要以军机处的人物与事件为中心,并对此加以拓展延伸,力图通过各种史料的比证,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历史。这样的写作方式,也使得本书的一些章节并不完全是军机处的内容,希望能向读者展示大历史背后小人物的作用。

本书以人物为中心,既重视军机大臣,也重视军机章京。当太平军派出的北伐军进至天津时,咸丰不得不违背祖制,以弟弟奕訢为军机大臣,坐镇中枢,扑灭北伐军,挽救危机。亲王入军机处,这也是危难之际的无奈之举。咸同二朝,

图香闲情

薛原

我一直记得当年在我们初中的一次语文课上,老师突然讲起了刘绍棠:一个写运河边人家天才作家。为什么说刘绍棠是天才呢?因为他读中学时语文课本里就选了他写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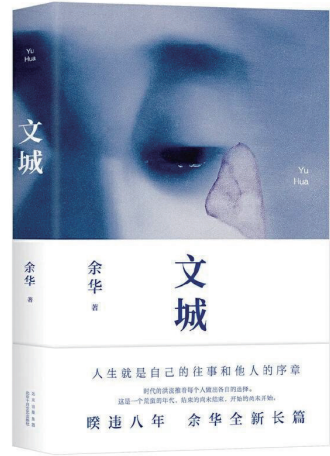
记住了刘绍棠这个名字,也就关注着到手的文学杂志,寻找着这个名字。1980年前后,也就是我从初中到高中的那几年,我看得最多的就是《小说月报》。学校里一位数学老师订了《小说月报》,她知道我喜欢文学,每期杂志她读后就到我们班里找我,把杂志送给我读。

那个时候,我的阅读是不加选择的,逮到就读。语文课本里的鲁迅、茅盾、峻青等的作品,提供了一个阅读选择;而各种新版的现代作家作品和新中国五十年代的小说如《青春之歌》《苦菜花》《战斗的青春》等也在重新出版,再加上“伤痕小说”开启的新时期文学,犹如几股不同的洪水突然合流奔涌到眼前。

几年过去,这种混杂的阅读才渐渐有了清晰的选择,从自己的阅读兴趣出发,从“权威”的判断出发。当时,我盯着的就是每年一本的全国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选。从1979年到1988年,那十年,每年的获奖作品选成了我阅读当年小说的依据。有一年见到一本厚厚的《小说拾珠》,也才醒悟原来

图马观书

《文城》 余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在溪镇,有一个叫林祥福的人,他一直在寻找,寻找一个在别人眼中根本就不存在的地方。那个叫作“文城”的地方,究竟是想象的归宿,还是遥远的北方?本书是作家余华的最新长篇小说。作品采用一贯的底层视角和民间叙事风格,以细腻流畅的笔触,书写主人公在命运浪潮中的爱恨和悲欢、寻找与坚守,讲述一个普通人“活着”的壮美故事。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文城”,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但是必须用最珍贵的生命去捍卫。

一部关于手艺人小说。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无论是修书、理发,还是制陶,但有一技傍身,便有了坚守理想的底气。那些融入血脉的手工艺,是生计,是倚仗,也是与岁月相守相待的凭据。作者以稚嫩的笔调去写拙朴的匠人生活,在对时光流逝的追忆中,不动声色地拂过淡淡的哀婉,拈出经过火炼风化的豁达与超然,让我们看到源自热爱而焕发出的熠熠光彩。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在张弛有度的节奏中逐次展开,成就了一本寓艺于义的佳作。

《文城》 余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文祥堪为军机处的顶梁柱,他主持了与英法联军议和,扑灭了东北马贼动乱、创办了神机营,开办了京师同文馆,暂时挽回了大清帝国的颓势,为有清一代满人大臣之翘楚。军机章京中的杰出人物颇多,如丁守存,喜好枪炮,并亲身实践,又曾在前方策划战事,一生堪为传奇。如王拯,诗歌文章冠盖一时,但性格耿介,终不合于当时,归而退隐。又如朱学勤,居中联系,为奕訢通风报信,在辛酉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

在本书之中,读者朋友将会与祁寯藻、彭蕴章、文祥、李棠阶、李鸿藻这些军机处的重要人物接触,也将看到军机处中的分歧、争斗、密谋。咸丰朝,由于肃顺崛起和军机大臣的老去,导致军机处日渐虚弱,御前大臣竟得以参与军机处事务,并在咸丰死后,形成了顾命大臣主持大政的格局。只是在辛酉政变之后,奕訢重新执掌军机处,方使军机处重新恢复权势。同治朝初期,由于慈禧尚未熟悉政务,放手让奕訢处理政务,军机处权势益重。随着慈禧对政务的熟练,双方不时产生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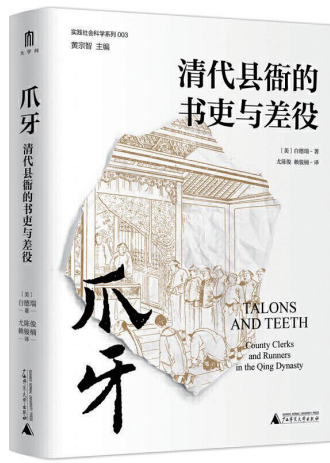
就晚清末年的军机处而言,虽然有诸多优秀人物入主其中,但军机处未能有大作为。盖因光绪执政后,军机处面临着皇帝与太后的权力竞争,庚子年巨变之后,又经历了大阿哥党、帝党、后党的激烈争斗。慈禧死后,进入宣统朝,一群后生小子主持朝政,军机处中也经历了诸多变革,面临着各种挑战。在晚清新政的热潮之中,军机处最终让位于责任内阁,告别了历史舞台。

历史的书写常受作者个人主观意志的影响,带有作者的私人烙印,只是深浅程度不一而已。虽然历史写作难免要受主观的影响,但著史者所能做的,且应该去做的,是尽量地还原客观历史。本书在写作中,尽可能不做主观评价,而以展示史实为主。到底,对历史的评判,恰如千人有一千种生相,我尽可能将评判权交给读者。

(《军机处二百年》袁灿兴著 岳麓书社出版)



图有所得



赵艳芳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学术著作,皆漫画式地将衙门吏役描述为贪腐成性、一心追求私利之辈。

如果县衙这一官僚机构的最低层级被贪得无厌的吏役所充斥,那么整个清帝国何以实现持续性运转?带着这样的疑问,美国汉学家白德瑞开始了对清代巴县档案的探索,于是,有了这本相当有学术分量的著作——《瓜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认为,《瓜牙》一书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的典范之作,自其出版以来,一直广为学界称誉。

深挖历史细节,还原真实图景

在《瓜牙》一书中,白德瑞在零碎散乱、复杂繁多的清代巴县衙门档案史料中,尽可能梳理还原历史细节,合理地描绘出了一幅清代县衙吏役的日常综合图景。

白德瑞从光绪朝巴县档案中,挑选出来500多卷档案,开始了最初的研究。想对这些档案文献加以利用,其中的难点之一,源于本书力图理解的那些惯例性的、非正式的运作方式所具有的高度地方性。例如,有关巴县衙门吏役们的内部组织架构及其程序的信息,零星散落在很多个不同的卷宗之内,且往往是用当地化的习惯用语加以表述的。

清代巴县衙门的书吏和差役们,创制出了并奉行着一些非常精细的惯例、规矩与程序,也被称为“房规”“班规”,“用来将诸如招募吏役新人、内部晋升和分派承办各种有利可图的任务等事项加以规范化和标准化。

但是,这些事实上发挥着行政法律制度之功用的惯例、规则与程序,却不被清代法律所承认。不过即便如此,上述这些惯例、规矩与程序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在弥补着由于缺乏正式规则所造成的空隙。

学术价值较高,学术启发性强

在构建以“瓜牙”为中心的清代基层社会运行的大叙事中,白德瑞表现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他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地方史、社会史、政治史,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相结合,展现了更为丰富的学术面貌。

这本出版于2000年的英文专著,有着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著名汉学家叶山(Robin D.S. Yates)教授说此书是“新兴的(中国)法律社会史领域的必备读物”之一。

在主要研究法律社会学的译者陈陈看来,迄今为止,白德瑞此书仍是继踵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之后,对清代衙门吏役研究的最具研究方法启发性的一本专著。白德瑞此书不仅进行了细致的史实挖掘,在前辈基础上做出了创新性的学术推进,而且还直接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重要学者的社会学理论进行对话并加以反思。

而后一特点使得本书的学术贡献不限于历史学界,还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界,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官僚制、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等社会科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富有启发性。

译文反复打磨,力求“信、达、雅”

在翻译上,本书译者忠于英文原著,将西方一些特有的学术表述做了本土化处理,契合清朝的时代语境,贴近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

举例来说,本书在谈到巴县衙门的某位书吏或差役不再担任书吏或差役时,最常使用的一个英文单词是 retire。如果直接将其译成“退休”,读者或许也能大致明白其意思,但这种译法显然不符合清代的语境。因此,如果回到清代,其准确的译法应当是“役满告退”。

除此之外,译者还做了以下尝试,比如:撰写了30多个“译者注”,对书中使用的普通读者或许不大了解的重要概念、术语加以解释,例如“咽噜”“厘金”等,而且还为书中提及的一些细节补充了背景性知识;对于一些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常见但中国(法律)史学界尚不甚熟悉的理论概念,在翻译时做了更贴近中国读者习惯的处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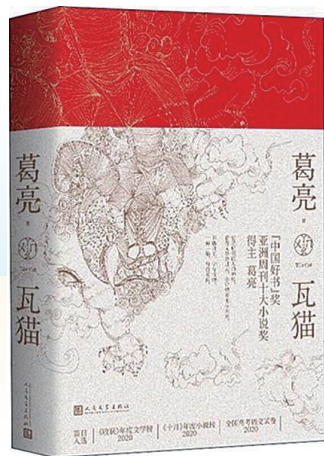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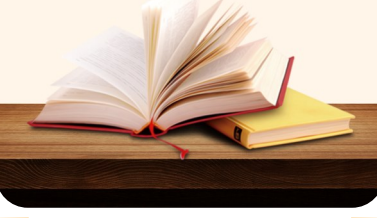
书吏和差役,是清帝国的“爪牙”,更是基层社会运行不可或缺之人,阅读本书,可以详细了解清代县衙书吏与差役的日常综合图景,从“瓜牙”透视大清帝国晚期的历史。

(《瓜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美)白德瑞著 陈陈、赖骏楠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的典范之作

——关于《瓜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悦读



《瓦猫》 葛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